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参与路径研究

□ 东 艳

[摘要]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出发,探寻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由此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内涵与模式。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发展变化由国际生产分工及分配模式这一国际经济基础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过程中,应通过不同规则差异化选择、国际制度安排选择及自主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全球经贸治理结构调整中,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适应的国际地位,构建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更高水平开放制度环境。

[关键词]国际经贸规则;规则重塑;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参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21)03-0027-14

[作者简介]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通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21世纪以来,国际经贸规则进入加速重塑期,全球价值链纵深发展对跨境制度协调的要求,数字经济新经济形态对数字新规则的需求,以及传统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国维持本国利益的诉求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深入分析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演进模式与规律,准确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内涵与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创新与变迁是研究国际问题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

法学、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动力、趋势进行探讨,然而,“规范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规范的起源、扩展和内化,还要注意规范发展过程中孕育的创新,或者说规范的重塑”^①。特别是崛起国如何突破守成国的规则锁定意图,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探寻有效路径?对这一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探讨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调适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动因与模式,在此基础上,从规则构建、国际制度安排、国内制度型开放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②

一、国际经贸规则:理论整合与评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过度专业化导致学术界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

收稿日期:2021-04-26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制度型开放”(项目编号:2020SJZSB02)的研究成果。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现实问题无法提供准确判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是处于各学科交叉地带的重要问题,近 10 年来,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进行了研究,制度经济学将国内社会和国内制度因素引入分析框架,研究规则背后的战略考量,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具体规则的含义和性质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贸易协定总体为视角的制度分析演化为以文本规则为支撑的制度分析提供技术支持。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存在急需填补的“交叉的裂缝”,更需要深入的分析框架来透析“规则重塑”的内涵及运动规律。^③

国际经济学领域对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体现于对规则的载体即国际贸易协定的分析,这些研究侧重于从经济学角度,对国际贸易协定形成原因、机制设计及经济效应分析,重点关注国际贸易协定的贸易自由化效应和动态经济增长效应。^④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是否加入贸易协定作为制度指标变量,在实证模型中以 0 或 1 作为虚拟变量赋值,或通过调整贸易成本的方式将制度变化纳入贸易模型。随着贸易协定规则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传统以经贸协定为整体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准确刻画现实发展情况。特别是体现 21 世纪经贸新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文本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后,学者们开始聚焦贸易协定文本分析,并引入文本为数据(Text as Data)等新兴技术分析方法,由此打开了贸易协定的黑箱,使以贸易协定总体为视角的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演化为以规则文本为支撑的制度效应分析。^⑤

国际经济法学探讨以国际法律形式存在的经贸规则的法律溯源、法律解释、行为准则,以及作为国际贸易法律规则载体的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原则、程序、变更和裁决规则等。国际贸易法学最初关注 GATT、WTO 等多边贸易协定的规则,以及欧盟的经济法律规定。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治理平台的发展,国际经济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体现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新区域贸易协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加拿大与欧盟综合经济贸易协

定》(CETA)、《美墨加协定》(USMCA) 等协定中的规则。在具体规则的研究中,服务贸易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中性规则、监管一致性规则等是当前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重点规则。根据廖凡的观点,国内现有对国际规则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规则内容及对中国借鉴和启示的分析,对制定该规则的动因及该规则在现有规则体系中处于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及规则实施成效如何及制定该规则的现实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分析有待加深。^⑥

制度经济学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对国际规则进行研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人在无制度存在的环境中做出理性选择,而实际上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观念来处理信息和辨识环境,这些先存的心智观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决定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深化方式(North,1990)。张宇燕和李增刚(2008)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国际规则的形成、变迁、实施等进行理论探讨。近年来,学者们从制度非中性、竞争性多边主义、现实制度主义和制度现实主义等理论视角,解释当前国际制度竞争问题。然而,对新形势下中国在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可能选项的讨论仍需要加强。^⑦

本文拓展现有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出发,探寻世界经济运行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由此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内涵与模式。以此思路来审视现有研究,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侧重在经济基础层面,关注规则的效应;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侧重在上层建筑层面,关注规则本身的条款解读;制度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分析制度的作用及其演变等问题,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某一个侧面进行研究,而对“规则重塑”所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没有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国际经济规则重塑的理论基础,探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动力和方向,探讨崛起国在实力攀升的过程中,在规则重塑中面临多重抉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经贸协定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关系重塑和规则构建双重属性,并将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从规则构建、国际制度安排及国内

制度型开放三个层面,探寻中国参与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

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理论分析

(一)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是国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的体现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与一定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引发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又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基于唯物史观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和过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视角,分析了该政变所体现的历史运动规律。随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⑧

基于唯物史观来审视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及世界秩序的发展规律,可以看到,国际分工体系、人们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利益分配模式构成了国际经济基础。而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意识结构则构成了国际上层建筑。国际经济基础决定国际上层建筑、国际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国际经济基础,是国际社会运行规律。但是,与国内社会有所差异的是,国际社会运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权力结构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组成,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主导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并在国际政治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⑨

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发展变化是由国际生产分工及分配模式这一国际经济基础决定的。分析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时,应当以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而不能脱离于此,仅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直接讨论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对标。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判断这样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这样一

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全球化模式调整及其引发的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构建及发展,使生产跨越一国发展,要求规则协调;二是技术冲击、数字经济的新型国际生产和分工模式,需要构建对应的新规则体系;三是大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使利益分配格局发生调整,国际规则制定权结构发生变化。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是国际上层建筑对国际经济基础变化的适应与反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矛盾运动过程既包括向上发展的运动,也包括向下发展的运动。向上发展体现在:在新经济基础发展中,规则主导国构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新规则体系,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谋求更大的收益,同时促进了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适应性构建;向下发展体现在:原有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要积极巩固有利于己的原有经济基础,通过规则约束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及分配利益。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价值理念输出,推广相应的经贸规则,实现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互动。

(二)国际分工体系及利益分配格局与国际经贸规则的矛盾运动过程

国家间实力的相对变化,使利益分配格局发生调整,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塑。19世纪英国面临美国和德国经济竞争时,曾经采用单边主义贸易政策来维护其在全球的领导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并构建了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在内的一整套治理体系,通过开放的多边主义,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随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欧洲一体化、石油冲击、日本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实力接连带来冲击或挑战,也对美国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地位产生影响,逐步引发美国国际贸易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调整。调整贸易政策及国际经贸规则战略是“巨人萎缩综合征”的表现之一。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冲击时采取的单边贸易政策与英国面对地位衰落时的行为相似。^⑩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

日本的产业竞争力逐步向美国逼近,日美经济从互补关系过渡到竞争关系。美国利用对贸易规则的控制权,借助多边和双边配合的方式打压日本发展。在 GATT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农业、服务业,以及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消除对外国供给者歧视;同时,美国在其 1974 年贸易法案 301 条款的基础上增加超级 301 条款,威胁对日本制裁,并与日本进行结构性协定谈判来设定对日本专属规则。^⑪

进入 21 世纪,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的份额逐步下降,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政府采用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风格各异,但实质上致力于通过重塑规则来遏制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权力增长,由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2001 年,布什政府提出“竞争自由化”贸易政策,提出对全球贸易秩序进行改造的主要目标:鼓励外国向美国的公司及农业主开放本国市场、促进外国采取美式商业法律和监管规范,以及鼓励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实现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目标。^⑫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主导地位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争论。2003 年 8 月 30 日,WTO 总理事会通过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缺乏或没有生产能力的较贫穷成员方可以更容易地进口经强制许可生产的更便宜的仿制药。^⑬

美国继而逐步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等平台,利用其他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特点,继续推进高水平知识产权等规则,挽救其在多边领域的失利。美国试图与其他成员国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等方式,推行美式价值理论和贸易规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内,涉及国内政策、要求更高市场规范性和开放度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在区域经贸治理层面酝酿。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区域经贸协定,促使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经贸新规则构建方面竞争加剧。特朗普上任后,美国转向通过双边经贸谈判来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2018 年 3 月,美韩就修订双边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协议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2020 年 1 月 29 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USM-

CA);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国和日本签署美日经济伙伴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签订第一阶段协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英国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在酝酿过程中。拜登政府继续加强美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控制力。2021 年 2 月 4 日,拜登在其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针对美国,如果美国的工人和知识产权得到保护,那么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论是中国或是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与美国匹敌。在此前的竞选演讲中,拜登就已提出美国必须与盟国协商制定全球经贸规则,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三、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新图谱

基于国际经济基础与国际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本部分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分类和审视,将国际生产关系变革引发的规则措施调整与国际实力变化中规则主导国的战略调整结合,力图描绘出一个全面的最新的体现国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规则演进新图谱,为后面研究崛起国参与规则重塑路径奠定基础。

对贸易协定中规则内容分类的研究(The content of trade agreements)一直是国际一体化协定研究领域讨论的重要基础性问题。^⑭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生产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引发监管一体化的制度需求,本文在规则措施分类中体现了国际贸易协定向监管一体化协定转变的新趋势。吉恩·M. 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等在 2019 年发表的文章指出,当前的贸易协定形态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其性质更接近监管一体化协定,而非贸易自由化协定。其实,早在 2015 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等都已指出,TPP 协定不是贸易协定。康宁·P. 格雷戈里(Corning P. Gregory)认为,TPP 协定的 30 章中,有超过一半的章节涉及监管问题。^⑮近两年,贸易协定向国内监管扩展的趋势愈加明显。现有研究一般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条款分为 WTO+(该条款包括在 WTO 中,但比 WTO 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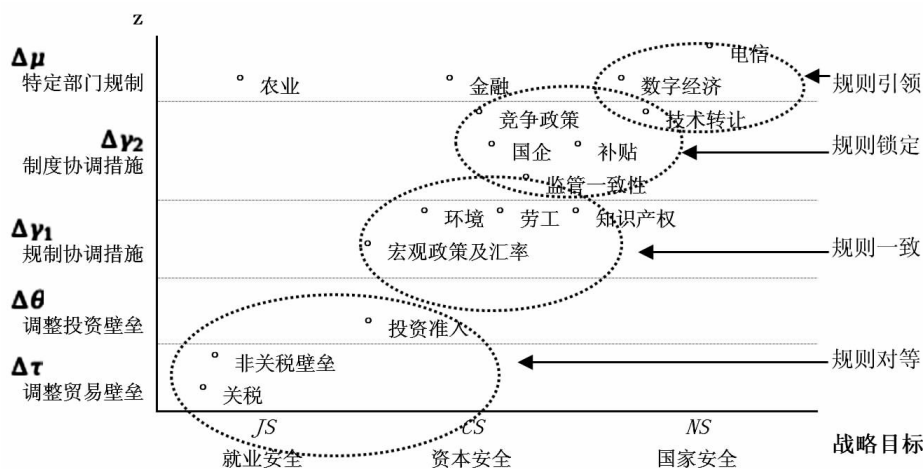


图1 战略—措施框架下的国际经贸规则新体系

定更深入),或WTO-(WTO中不包括的条款)。而WTO规则基于主要基本传统贸易模式而达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国际生产模式的发展。^⑥本文根据当前最新协定的发展趋势,将经贸规则措施分为调整贸易投资壁垒、经济总体规制措施及特定部门规制措施。

第二,传统对贸易规则分类的研究没有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上层建筑关系,本文关注国家经济实力变化所引发的战略调整意图,特别是美国新国家安全观对其贸易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纳入分析。

第三,对规则载体,即国际经贸制度安排的研究对象范围进行了更新和扩展。近10年来,对规则研究一般基于区域一体化协定展开,同时,相关综合性数据库的数据通常截至2015年。^⑦然而,近两年来,全球经贸秩序演进发生了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在双边、区域及多边领域,一些新规则不断发展,本部分不仅分析了最新的区域一体化协定中的规则,也对其他治理框架下的规则发展进行了研究,如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级会议相关提议、美欧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内容等,由此为第五部分研究国际制度安排与崛起国规则重塑路径选择奠定基础。

(一) 战略—措施框架下的国际经贸规则新图谱

本文从战略目标、规则措施两个维度,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分类。图1展示了

战略—规制视角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图谱。根据措施深度,将国际经贸规则分为五组, $\Delta \Pi^d = \{\Delta \tau, \Delta \theta, \Delta \gamma_1, \Delta \gamma_2, \Delta \mu\}$,其中 $\Delta \tau$ 为调整贸易壁垒的相关措施, $\Delta \theta$ 为调整投资壁垒的相关措施, $\Delta \gamma_1$ 和 $\Delta \gamma_2$ 为对经济总体进行规制的措施,其中 $\Delta \gamma_1$ 为规制协调型措施, $\Delta \gamma_2$ 为制度协调型措施, $\Delta \mu$ 为对特定部门进行规制的措施,在纵坐标方向表示。美国引领国际经济新规则欲实现的战略目标,可分为三个方面: $G = \{JS, CS, NS\}$,其中JS为就业安全,CS为资本安全,NS为国家安全,在横坐标方向表示。措施的影响,包括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础图谱基于最新的高标准贸易投资协定文本分析基础绘制,包括双边、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及WTO改革方案建议。从《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JEP)^⑧的规则分布可以看出,基础图谱所涉及的规则在美式和欧式新贸易协定中基本都有涉及,表明这一规则分类体现了当前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现状。其中,略有差别的是,欧盟分别与日本及加拿大签订的协定中,包括了单独的补贴章节,而美式协定中目前这方面的规定还没有单独成章。在USMCA中新增加了宏观政策与汇率章节,其他协定中尚没有单独章节。此外CPTPP作为南北协定,包括发展、合作及能力建设章节,而USMCA则无相关独立章节。

将上述规则新趋势的主要内容进行归并,可以分为四方面,在图 1 中,用四个区域来表示:

一是规则对等。以就业安全、解决贸易失衡为主要目标,距离左下角最近的区域,表明贸易自由化的相关政策,包括调整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例如,美韩双边贸易协定修改中,提出在汽车领域,有助于美国汽车厂商进入韩国市场,限制韩国对美国钢铁出口等具体规定。在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包括了具有量化目标的扩大贸易章节。这一领域是传统国际经贸规则,如 WTO、区域贸易谈判涉及的内容,但最近几年来,这方面最大的调整是:美国等在经济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不再承担大国责任,而要求实现对等贸易,如美国在 WTO 改革方案中要求解决“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

二是规则一致。加强国内监管政策协调,促进生产一体化,对规则进行协调,实现投资资本安全。如环境、劳工、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规则,深度一体化规则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推动下,引入国际经贸规则讨论的范围,纳入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认为一些国家的国内规则影响了外国的市场准入,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条件。最新协定强调各国监管合作,推动缔约方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磋商和协作机制,以促进监管一致性,从而确保成员国市场上的商业主体享有开放、公平、可预期的监管环境,这体现了由各国国内监管一致性向成员国的区域监管一致性扩展的趋势,透明度、反腐败、汇率等规则也体现了深度协调国内规则的特点。

三是规则锁定。制度协调型措施,对所谓“非市场经济”进行规制,通过加强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的规定,约束其他国家行为。例如,在 USMCA 中,包括了规定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时可能受到惩罚的“毒丸条款”。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是 CPTPP 中新增加的章节,将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与国内制度和改革相联系,规范成员国政府和企业行为。同时,补贴规则日益成为中国与美日欧矛盾的焦点,在欧盟分别与日本、加拿大签订的双边协定中,包括单独的补贴章节。2018 年以来,美国多次通过 WTO,针对中国产业政策和补贴问题提出质疑,同时在美日欧通过七次三方部长级会议,推动达成关于补贴和国有企业新规则,以形成对“第三

方市场”的规则约束。

四是规则引领。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构建高标准新规则,确保本国在未来竞争中处于领先。例如,《美日数字贸易协议》是当前最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美日两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力求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一规则分类把握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规则对等、规则一致与规则锁定体现了原有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积极巩固有利于己的原有经济基础,通过规则约束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及分配利益。而规则引领体现了向上发展中,为适应新经济基础发展,规则主导国加紧构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新规则体系。这一规则分类也有助于将不同规则的差异纳入制度竞争研究,并为国际制度安排与国内开放路径选择研究奠定基础。例如,中美通过双边直接谈判签订的第一阶段协定中,议题聚焦规则对等和规则一致,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等。而发达经济体构建的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级会议协调机制,侧重讨论对中国规则锁定和规则竞争的议题,包括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数字经济等问题,集中于规则图谱右上方区域,这也将是中美未来谈判的焦点。

(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矛盾运动过程

国际经济基础中权力结构调整引发国际上层建筑的变化,在制度变迁所体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制度创新,即国际上层建筑的调整通常落后于国际经济基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模式由其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具体来看,一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中的影响力受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国际竞争力、国际协调能力、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程序及政治军事霸权等综合因素影响。考克斯(Cox,1996)指出,制度和物质力量关系有时存在不一致,兰斯·E.戴维斯(Lance E.Davis)和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滞后供给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对制度的新需求,会引发制度创新,但这些创新通常是为适应新需求而进行的滞后调整。同时,受路径依赖等因素制约,

制度体系的变化滞后于国际权力版图的变化。例如,1944—1945 年安理会的决议对日本和德国在联合国的作用至今依旧有影响。^⑨一国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有利于提升生产率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后者包括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面对逐步减弱的国家竞争力,霸权国家利用国际规则制定权来维护优势地位。

图 2 展示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所经历的矛盾运动过程。其中纵坐标反映经济实力或规则制定实力, PE_{us} 和 PE_{cn} 代表经济实力(Economic Power), PB_{us} 和 PB_{cn} 代表规则制定实力(Bargaining Power),横坐标为时间进程。 PB_{us} 和 PE_{us} 线向右下方倾斜,代表美国实力下降的过程, PB_{cn} 和 PE_{cn} 线向右上方倾斜,代表中国实力上升的过程,由于规则制定权转移的滞后性, PE_{us} 与 PE_{cn} 线早于 PB_{us} 与 PB_{cn} 相交。在从初始均衡到 C_1 之前,规则竞争已经展开,而在 C_1 和 C_2 之间时,制度失衡处于爆发阶段,规则竞争异常激烈,而在 C_2 之后,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目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正在经历从旧规则体系向新规则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图 2 中,从 C_0 向 C_1 和 C_2 方向演进),美国参与国际制度重塑的目标是建立维护其国家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并阻碍体现世界经济政治新结构的国际经贸新规则体系构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呈现出以权力为导向的特点。在这一转变中,美国试图利用既有的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利用制度供给滞后性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制度构建:一是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过程中(PE_{us} 与 PE_{cn} 线的差距缩小)减少本国原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求崛起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如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去除发展章节,要求对等贸易等;二是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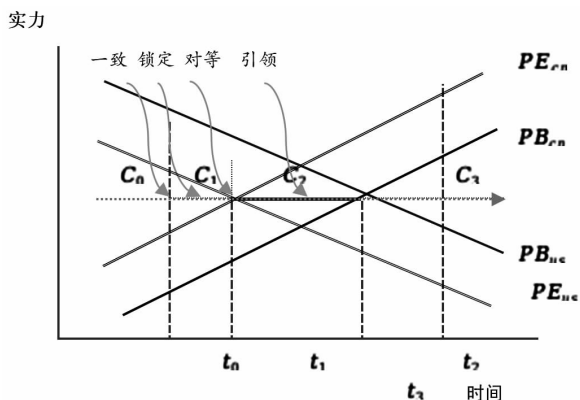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矛盾运动

其在现有规则体系中的主导权(PB_{us} 与 PB_{cn} 线的差距大于 PE_{us} 与 PE_{cn} 线的差距),加紧推行更多非中性规则,以求维护其竞争优势;三是加紧为未来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型全球化构建制度框架。

四、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路径:不同规则的差异化选择

国内研究国际制度竞争学者近年来的诸多研究成果指出,从整体看,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进程体现了渐进式特点,即从利用现有规则体系寻求自身利益,到主动参与制度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再到改变、转制及建制,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在从简单的参与者向承担更多责任的管理者角色转变。^⑩然而,对具体参与规则重塑解决方案的讨论仍然欠缺,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的加总视角,将制度集合作为整体来研究不同,本文关注了制度集合中的规则的差异性,对规则竞争中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

一国规则制定的参与形式取决于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在同一阶段,各项规则所涉及领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制度结构存在差质性,导致各规则所处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有所不同(图 2 在此处可以理解为各规则不同发展阶段图),所以崛起国在同一阶段面临的制度集合约束中,对各规则的参与形式有差异。下文基于规则差异性,以典型规则为代表,探讨了崛起国参与规则重塑的不同方式。

(一)参与规则创建:以数字经济规则为例

规则创建指依据国际经济基础的新发展方向,在新领域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国际制度等国际上层建筑。未来大国竞争的关键在于技术与创新领域,这是确保军事利益和商业繁荣的基础,高新技术领域、数字经济相关经贸规则是数字全球化下大国规则竞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大幅萎缩,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及全球竞争日益加剧。在这一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原有规则的束缚,路径依赖的影响极弱,市场势力、技术水平、政治影响力等对新规则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各经济体在这一领域竞争加剧,正在逐步形成各有侧重的规则主张,其中,中国和美国是确定未来网络空间贸易规则走向的最重要的国家。^⑪

美国推进数字经济规则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从经济实力角度,基于自身在跨境数字服务领域的显著引领地位,在相关规则中明确采用“数字贸易”概念^②,侧重于数字化交付内容及服务的相关规则^③;二是从理念上,主张消除跨境数字贸易壁垒,发挥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三是在推进路径上,从多层次推进,从最初在 WTO 层面进行协商,到加强与贸易伙伴国在 TPP 等 FTA 协定中引入全新的电子商务章节,在 USMCA 中引入更新的数字贸易章节,并逐步聚焦于构建权力更集中的“轴心治理(Hub governance)”模式,达成美日数字贸易协定。^④

与此对应,中国推进数字经济规则有如下特点:一是从经济实力角度,基于自身在电子商务平台领域的全球优势地位,在相关规则中明确采用“电子商务”概念,侧重于以网络为媒介的传统贸易的新交易平台的相关规则^⑤;二是从理念上,采用审慎态度,特别是在跨数据自由流动、数据本地化保存等方面;三是在推进路径上,参与了 WTO 等框架下的谈判,在 FTA 层面推进电子商务取得一定进展。

总体来看,中国在此领域参与规则竞争中需要更长远的视野,考虑中国具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优势,应更主动地参与相关规则谈判,积极前瞻性地对跨境数字服务规则设计进行研究。在理念上,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在此领域较为相近,未来可进一步对接欧洲的监管型理念;在机制设计中,借助 RCEP、“一带一路”等,推进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新规则。同时,继续发挥中国在此领域世界级企业的引领力。

(二)促进规则重塑:以竞争中性为例

规则重塑是一种规则创新,但这种创新并非提出新规则,不是已有规则的消亡和被替代,也不是规则被接受者完全内化,而是原有规则在扩散中被新行为体赋予和充实一些新内涵,使规则内容更丰富和完善。国际规则可以促进国内政府机构的变化,从而间接锁定政策取向和国家承诺。^⑥竞争中性规则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工具。在这一领域的规则已经由发达经济体基本达成共识,并在美欧主导的新贸易协定中向发展中国家推进。面对发达经济体在此领域对中国进行规则锁定,需要加强规则重塑。

美国推进竞争中性规则方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从经济实力角度,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国有企业规模方面差异巨大,美国国企数量极少,美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引入“竞争中性”规则,其目标直指中国国有企业,该规则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工具。二是从理念上,美欧等国指责中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从“非市场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指责。三是在推进路径上,“竞争中性”源于澳大利亚国内法律制度,之后 OECD 提出了相关指南,而美国国内并无相关法律实践,美国将该规则引入区域贸易协定中,本质是对中国进行规则锁定。

从崛起国角度看,中国应促进规则重塑。竞争中性主要涉及市场结构问题,中国在竞争政策领域规则设计方面处于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中国国企改革与竞争中性相关要求在方向上并不矛盾,中国应加速自主改革,突破规则锁定,将外部压力转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如对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国有企业分类等领域进行改革。针对超越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坚持强调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例外”,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坚持规则基础的非约束性原则,而非“硬性原则”,以“规则指导原则”的方式加强国家间政策协调,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提高相关规则的适用性和包容性。^⑦

(三)加强规则协调:以监管一致规则为例

规则协调指加强各国规则、标准、实践的协调。监管一致性规则是发达经济体促进深度合作、提升合作潜能的重要规则。其目标是推动各经济体在国内监管中推行良好监管实践,促进监管一致性,加强监管合作,从而确保本国企业在区域或国际市场上的商业主体享有开放、公平、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发挥国内监管对实现区域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美国推进监管一致规则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从经济实力角度,发达国家间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根据 WTO 统计,目前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工业品平均关税已经低于 1%,这与 1947 年时 40% 的平均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并已经取消大部分配额,这些国家间的合作越来越向监管层面转移;二是从理

念上,倡导透明的可预期的监管环境;三是在推进路径上,从多层面逐步深化。在 WTO 层面,监管协调致力于解决歧视性监管政策,对于非歧视性的、但缺乏效率或重复性的监管政策则没有充分的规定。APEC 和 OECD 对监管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当前全球重要自由贸易协定(CPTPP、USMCA、E-JEPA、CETA)文本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区域层面积极推广边界后监管一致性规则,对监管一致性原则和目标、建立协调和审议程序或机制、监管影响评估、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监管磋商合作、监管措施回溯及促进监管相容性展开协调。

“监管一致性”原则有助于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中已经逐步体现该原则。^⑧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中尚未引入和国际对接的良好监管实践及监管影响评估的内容,在此领域可加强规则协调,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国内规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让渡管理权主权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关注这一规则对国内监管自主权的影响。同时,各国的监管目标、监管方式选择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完全与美国、欧盟等要求一致,应倡导有效的监管,并不是单纯地减少监管或增加监管,并强调国内监管权的独立性,注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有序推进。

(四)适应规则对等:以“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为例

近两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提出的 WTO 改革方案中,多次提到中国不适合继续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 WTO 的优惠待遇。从经济实力看,这是双方在实力逐渐趋近的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从理念看,这一要求体现了所谓美式公平贸易原则;从推进路径看,美国在多边、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将其公平贸易原则作为重要原则;从直接目标看,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从措施手段看,是要求绝对对等。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成就显著,若继续按现有方式享受 WTO“特殊和差别的待遇”,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在继续坚持自身所处的发展中国家阶段,坚持 WTO 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反对直接对等的前提下,应对 WTO 成员方分类改革作出预案,在一

定程度上回应发达经济体的关切,在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继续支持 WTO 促进发展和能力建设,促进 WTO 适应新形势而变革前进。

(五)弥补规则赤字:以发展规则为例

规则赤字指在实力下降的过程中,霸权国家不愿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在一些领域出现规则赤字情况,特别是在发展领域。中国应在区域合作层面积极推进与发展领域规则的构建。例如,在疫情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抗击新冠疫情相关的经贸合作,在《APEC 贸易部长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声明》《东盟与中日韩(10+3)经贸部长关于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中国—东盟经贸部长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自贸合作的联合声明》文件中提出了相关区域和国家应对疫情的框架性主张和建议。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新西兰和新加坡在 2020 年 4 月推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物品贸易声明,列出了两组详细的商品清单,约定对清单商品分别减免关税、不使用出口限制、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等,同时规定该声明对其他 WTO 成员开放,该声明被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认为是可以成为未来引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新章节的模板。^⑨与此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中可以更加主动,并可借助已有机制,如落实《“一带一路”医卫合作实施方案》,同时,特别注意要从宏大叙事向更细致的机制化制度设计转变。

五、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路径:国际制度安排选择与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

在崛起国参与规则重塑过程中,如何选择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路径,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提出了 FTA 等国际经贸治理机制所包括的两个维度。例如,东艳、苏庆义指出,TPP 包括地缘经济合作与规则两个层面;李巍认为,贸易领域以 FTA 为代表的机制竞争中,包括规则竞争和伙伴争取两个方面。^⑩然而,这些研究将贸易机制中所包括的机制和地缘经济合作两层面作为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分别分析,还没有考虑两个维度之间的互相作用。本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分析。由于成员国差异,在不同机制

表 1 崛起国的参与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

	在位国	代表性规则	路径依赖	崛起国			
				规则制定实力	经济实力	决策	制度选择
1	规则竞争	数字经济	弱	一般	优势	参与规则创建	中国主导的 FTA ,RCEP 等
2	规则锁定	竞争中性	一般	弱	-	促进规则重塑	中美双边经贸协定
3	规则一致	监管一致性	较强	一般	-	加强规则协调	中日韩 FTA 等
4	规则对等	“发展中国家地位”	强	一般	较强	适应规则对等	中美双边经贸协定
5	规则转变	发展与合作	较强	较强	较强	弥补规则赤字	“一带一路”、RCEP、中国东盟

安排中,某一国家的相对规则制定实力或相对经济实力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考虑参与规则重塑方案时,需要加入对最优的国际制度安排的讨论。

在制度安排选择中,需要考虑三个要素:一是考虑不同机制中,经济基础的特点,如经济发展程度水平及国际分工关系等;二是现有规则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某一机制是否具有不同的、代表各自利益的竞争性规则方案;三是需要关注路径依赖,应考虑已有规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面对具有不同竞争性方案的规则,谈判各方成员结构差异越大,各方为了让渡权利而需要投入的资源越多;而在处于治理赤字范围的一些规则、各方成员结构差异较大的南北协定中,反而利于推进。此外,在分析中还需要避免单项规则加总谬误,贸易一揽子协定谈判中,为达成协议,各国通过不同规则来进行利益交换,由此对规则重塑分析路径产生影响。表 1 列出了崛起国参与规则重塑的路径选择。

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是协调和引领规则的有效平台。对于非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发达国家提出的焦点问题,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协定等方式,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协调。中美双边制度协调,目前已经从结构性对话进入结构性谈判阶段,双方通过逐步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有法律基础的协定,以期达到稳定的、可预期的效果,在结构性谈判协定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商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者中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对双方经贸焦点问题提供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如对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等提出了具体的行为要求、制度框架和执行措施。中国可加强中欧自贸协定、中英自贸协议谈判,充分利用好双边谈判的优势。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已有优势,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次,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继续扩大与美欧贸易合作。

在亚太层面,亚太价值链的发展为本地区制度安排深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可以就监管一致性进行协调,三方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 RCEP 协定的实行及未来升级,以及中国探求加入 CPTPP 协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经贸联系密切、区域机制成员国范围较广的特点,推动数字经济规则等中国可能参与规则竞争的新规则。在“一带一路”合作以及南北型自由贸易协定中,注重发展、合作、公共卫生议题的规则设计,促进相关规则引领,主动建制,同时拓展规则集合。

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中国在近年来的发展成就显著,和其他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拉开了一定的差距,中国很难继续按照现有方式享受 WTO“特殊和差别待遇”。实际上,中国已经在信息技术产品协定扩围谈判等领域做出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承诺。在不同的协定中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承担不同的责任。比如在允许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多边贸易规则和纪律时保持一定灵活性的条款方面,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政府采购协议》等协定中涉及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中,中国继续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而在中国发展比较完善的领域则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考虑 WTO 成员方的不同利益诉求较多的情况,在规则竞争中对发达经济体可形成一定的牵制,在此框架下,推进数字经济等规则。

中国的自主的制度型开放为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解开束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与国内改革相互促进。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进行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通过政策、制度调整,来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对促进国际规则竞争,加强制度协调具有积极的意义。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重要安排,同时体现了中国通过主动开放,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战略选择。

制度型开放通过自觉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当前制度型开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构建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继续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促进金融等领域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与此同时,制度型开放与更侧重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的传统开放模式有所不同,更侧重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即图1中右上方区域的相关内容。对于“竞争中性”“金融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规则,应与中国改革进程结合,通过自主制度型开放来对接新规则。中国正在营造与国际高水平对接的经贸规则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应先行先试那些反映了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制度需求的贸易投资新规则,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践,探索和引领高水平开放。

结论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本质是国际上层建筑对国际经济基础变化的适应与反作用过程。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国际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和发展变化是由国际生产分工及分配模式这一国际经济基础决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全球化模式调整和参与国实力相对变化及其引发的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构建及发展,使生产跨越一国发展,要求规则协调。技术冲击、数字经济的新发展模式,需要构建对应的新规则体系;而大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使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调整,国际规则制定权结构发生调整。

基于国际经济基础与国际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本文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分类和审视,将国际生产关系变革引发的规则措施调整与国际实力变化中规则主导国的战略调整结合,力图描绘出一个全面的、最新的、体现国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规则演进新图谱,规则对等、规则一致与规则锁定体现了原有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要积极巩固有利于己的原有经济基础,通过规则约束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及分配利益。而规则引领体现了向上发展中,为适应新经济基础发展,规则主导国加紧构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新规则体系。

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应深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不同规则差异化选择、国际制度安排选择及自主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治理结构调整中,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在全球贸易规则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构建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对于结构性问题相关的规则,通过加大自主开放力度,与高标准规则对标,突破规则围堵。对于数字经济等有竞争优势的规则,中国应该在自身具有较强主导力的双边和区域协定中,积极推进中国主张,利用中国所具有的市场实力,参与国际新规则谈判竞争。在发展、合作和能力建设等领域,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等,积极加强相关规则构建。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马涛、田旭、徐秀军、杨盼盼、杨原、赵海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袁正清.规范研究应突破单向的线性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2-12.

②“规则锁定”概念的最早使用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清华金融评论,2018(7).现有研究需要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变革路径分析,如唐

世平(2019)指出“在具体制度变革中,中国不应大而化之地讨论‘制度’之争,而应将重心放在提供解决方案上,完善对制度的认识,从而做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革”。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J].中国社会科学,2019(3).李国学和东艳(2020)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从国际生产方式变革的制度需求与供给视角,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塑进行了探讨。参见:李国学、东艳.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与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J].学海,2020(5).

③ Akerlof, G. A. Sins of omis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 (2): 405- 418. 李巍在讨论研究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方法时,采用了“交叉的裂缝”一词,认为如果不进行一种跨学科的努力,某些处于学科交叉地带的社会事实将处于学术研究的“贫瘠地带”。参见: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D].复旦大学,2009:12.

④ 相关研究的系统综述可参见 Limão Nun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2138, 20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https://www.nber.org/papers/w22138>; Bagwell Kyle and Robert W. Staiger. The 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2087, 20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https://www.nber.org/papers/w22087>; Grossman Gene M. The purpose of trade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2070, 20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https://www.nber.org/papers/w22070>.

⑤ 东艳.深度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J].经济学(季刊),2009,8(2): 397- 426. Osnago Alberto, et al. Deep trade agreements and vertical FDI: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52(4): 1-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Alschner Wolfgang, et al. Text- as- data analysi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mapping the PTA landscape [R]. UNCTAD Research Paper No. 5, UNCTAD/ SER. RP/ 2017/ 5,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1838>.

⑥ Andrew Guzman and Joost Pauwely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M]. Third Edition, Aspen Casebook Series, 2016; Petersmann Ernst- Ulrich. Methodology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adjudication [R]. Jindal Global Law Review, 2016, 7(2): 279- 332. 参见 Bahri Amrita and Lugo Monica. Trumping capacity gap with negotiation strategies: the mexican usmca negotiation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3, No. 1, March 2020, pp. 1- 23; Chaisse, Julien, et al.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ule- making: TPP as a new model for trade agreements [M]. 2017. Springer; 石静霞.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 张乃根.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塑[J]. 法学, 2016(5). 廖凡. 从“繁荣”到规范: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 政法论坛, 2018(5).

⑦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李向阳. 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9). 张宇燕、李增刚. 国际经济政治学[J].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131. 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现状, 李巍和罗仪馥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参见: 李巍、罗仪馥. 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4).

⑧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 人民出版社, 2015.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人民出版社, 1976.

⑨ 相关讨论参见: 张宇燕、任琳. 全球治理: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国际政治科学, 2015(3). 李滨、杨蓉荣.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J]. 欧洲研究, 2019, 37(2).

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1991年的文章中, 提出“巨人萎缩综合征”, 参见 Bhagwati J. The 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 [J].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3, 72(2).

⑪ 东艳. 制度摩擦、协调与制度型开放[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⑫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nsifying Free Trade Negotiating Agenda Calls for Better Allocation of Staff and Resources.

- GAO-04-233 International Trade,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4. <https://www.gao.gov/new.items/d04233.pdf>.
- ⑬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03_e/pr350_e.htm.
- ⑭ 相关讨论参见: Claudia H, Alberto O, Michele R.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World Trade Review, 2018:1-34.
- ⑮ 相关讨论参见: Grossman, Gene M., et al. The 'New' Economics of Trade Agreements: 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Regulatory Converge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6132, 2019.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132>.
- Stiglitz Joseph E. and Adam S. Hersch. The Trans-Pacific Free-Trade? Charad. October 8, 2015.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rans-pacific-free-trade-charade>; Krugman Paul, "This Is Not A Trade Agreement", May 1, 2015, <https://equitablegrowth.org/must-read-paul-krugman-not-trade-agreement/>. Gregory P. Corning. The limits of market power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path dependence and loss avoidance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8, 31(1).
- ⑯ 东艳和苏庆义将TPP文本30章的内容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议题的深化, 第二类是深度一体化议题, 第三类是横向新议题, 第四类是其他制度性议题。这一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当时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特点, 但仍是以WTO为对照组来进行分类, 本文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参见东艳, 苏庆义. 揭开TPP的面纱: 基于文本的分析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6(01).
- ⑰ 数据参见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content-deep-trade-agreements>.
- ⑱ 文章原稿中包括《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JPA) 等协定的图谱, 因篇幅所限, 发表版本中没有包括此部分, 有需要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 ⑲ 李向阳. 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09): 67-76+6. Davis L. E. and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Cox, R. W.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J].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 10 (2): 126-155. Davis L E, DC North, Fushfeld D R, et 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⑳ 如徐秀军从规则制定主体的综合实力差异出发, 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两种参与路径: 霸权国家的规则外溢型参与及新兴国家的规则内化型参与。徐秀军.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9). 其他相关研究还包括: 田野.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高程. 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12).
- ㉑ 目前, 欧盟也在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不过, 欧盟由于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经济实力不占优势, 同时, 欧盟各国的观点还有不少差异, 欧盟与美国的数字贸易规则理念和方案也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未来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竞争将主要发生于中美之间。韩剑、蔡继伟、许亚云的研究涉及对“欧式模板”的分析。参见韩剑、蔡继伟、许亚云. 数字贸易谈判与规则竞争——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量化的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1): 117-135。
- ㉒ 关于数字贸易及规则研究进展的综述, 参见陈维涛、朱柿颖. 数字贸易理论与规则研究进展 [J]. 经济动态, 2019(09): 114-126. 相关研究还包括: Gao H. Digital or Trade? The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 China and US to Digit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8, 21 (2): 297-321. Yoo, Tae I.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 Regime Diffusion by the Powerful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into Cyberspace [J]. Pacific Focus, 2017, 32 (3): 375-395. Corning Gregory P. The Limits of Market Power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Path Dependence and Loss Avoidance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

tions[J]. The Pacific Review, 2018, 31(1):1- 19.

②③根据2020年9月的数据,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一半,分别为Amazon、Alphabet (GOOGLE)、Facebook、Netflix、Salesforce,其中,除了Amazon为电子商务平台类公司外,其他几大公司均以提供数字服务为主,同时这些公司也是全球性服务商。数据来自于:<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ersonal-finance/030415/worlds-top-10-internet-companies.asp>.

②④治理轴心的相关讨论参见:Soo Yeon Kim, Mark S. Manger. Hubs of Governance: Path Dependence and Higher- Order Effect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Formation [J].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2017, 5(3).美日数字贸易协定文本参见:<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japan-korea-apec/japan-us-japan-trade-agreement-negotiations/us-japan-digital-trade-agreement-text>.

②⑤根据2020年9月的数据,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四席,分别为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度,其中阿里巴巴、京东为电子商务平台类公司,平台上销售的主要是传统贸易产品,腾讯和百度以向中国境内提供数字服务为主,对跨境数字贸易规则尚无急迫需求。数据来自于:<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ersonal-finance/030415/worlds-top-10-internet-companies.asp>.

②⑥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亢晓妮.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英文)[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7,(3).田野.国际经贸规则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3).

②⑦澳大利亚、经合组织、美国的相关文件参见:<https://treasury.gov.au/publication/commonwealth-competitive-neutrality-policy-statemen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governance/competitive-neutrality-and-state-owned-enterprises_5kg9xfjgdh96-en;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17-State-Owned-Enterprises-and-Designated-Monopolies-Chapter.pdf>; <https://usmca.com/state-owned-enterprises-and-designated-monopolies-usmca-chapter-22/>。关于中国相关政策的详细讨论参见:东艳、张琳.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J].当代亚太,2014(6).

②⑧例如,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促进监管高效便捷”,河南省政府发布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重大改革专项总体方案》、《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务服务体系专项方案》中,提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围绕这要求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96.htm. <https://www.henan.gov.cn/2017/11-10/239812.html>。

②⑨相关文件参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5/2020050296143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5/20200502968128.shtml> Singapore- New Zealand Declaration on Trade in Essential Goods for Combat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April 15th, 2020. <https://www.mti.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04/Singapore-concludes-negotiations-with-New-Zealand-for-Declaration-on-Trade-in-essential-goods>. UNESCAP, Policy Hackathon Introductory Briefing, 2020.6.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policy-hackathon-model-provisions-trade-times-crisis-and-pandemic-regional-and-other-trade>.

②⑩参见:东艳、苏庆义.揭开TPP的面纱:基于文本的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16(1).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4).

责任编辑:陆焱